

香港 广场

【全文】邹幸彤“六四煽惑集会案”自辩词

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这些字眼，不如说，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



2021年9月8日，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被拘捕后被警方押往警处。摄：Tyrone Siu/Reuters/达志影像

2021-10-25

输入标签

【编者按】：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被控今年六四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她早前否认控罪，案件今日在

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邹幸彤本身是大律师，没有聘请律师代表，在庭上采取自辩。控方案情指，邹幸彤5月29日在Facebook及Twitter发文，及6月4日于明报刊登文章，控方指这些文章属煽惑他人。邹幸彤则指当局企图打压、消灭六四记忆。以下为邹幸彤庭上自辩全文。

阁下，本人是本案唯一被告。

本人被控一个没有发生过的集结，本人是一位大律师，自 2015 年底起出任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副主席，直到支联会在刚刚的 9 月 25 日宣布解散为止。我没有案底，目前因为支联会的关系，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未有按通知提交资料而处于还押。同时也因为去年六四烛光悼念，被控煽惑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会在 11 月开审。

从刚刚的自我介绍，法庭不难见到，我所有的法律麻烦，都是同支联会、六四相关的。而这个控罪的层层叠加，其实都很形象地反映著，政权如何一步步打压消灭六四的记忆。而这一个大的背景，是我为什么要写本案中两篇文章的原因。

要正确理解两篇文章的意思、我写两篇文章时的意图，以及另一个议题，政权行动背后有无不当政治目的，必须要了解两篇文章出现的前因后果，而不是只看字面意思。支联会其实是成立于 89 民运期间，承载百万港人对民主中国的期许。当年这场和平的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支联会就用每年六四维园的烛光，用我们的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去传承 89 民运的精神，以及希望为死难者讨回一个公道。

32 年来，六四维园见，是无数香港人每年最重要的约定之一，甚至可以说是香港每年最标志性的活动，是香港人良知的象征。我们用维园的烛光，用令世人惊讶的毅力，守护住了六四的真相。起码在香港，一讲起八九六四，大家会知道军队入城的时候的乱枪扫射，会知道被坦克车碾断双腿的方正，知道睡在板车上流血的 9 岁小学生，知道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绝食的大学生们，知道当年这场运动多么得到全国上下甚至党政机关的人的支持，也会知道王丹、吾尔开希、刘晓波这些名字，知道那位只身走上长安大街挡住坦克的“坦克人”，知道只是想悼念她们的孩子都要面对重重困难的天安门母亲。

但这些知识不是必然的，因为政权一直用它的权力、法律、宣传机器，去抹杀、改写这一段历史。所以在国内的网络上，六四是打不出来的敏感词，每年到了 6 月 4 日这个日子附近，天安门母亲、民间的行动者都会被严格地控制，甚至是预防性拘捕。几年前，有记者去北京，走访大学生，拿著“坦克人”的照片，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2014 年，浦志强律师和几位朋友办六四研讨会，被捕，判足 4 年。2016 年，陈兵、符海陆、罗富誉、张隽勇，只是因为做了一支六四的酒，夸张到被人说是煽动颠覆国家，关了差不多 3 年才给其中 3 个人缓刑。还有办六四祈祷会的王怡牧师、只是拍了一张八九六四车牌的尹旭安、举著勿忘六四纸牌的张五洲，全部被拉、被锁。这里有一些辩护人声明，关于刚才提及的案件情况，想呈上给法庭。

刚刚讲到，因为政权的种种打压，八九民运我们香港知道是什么事，但在深圳河对面，就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军队入城是平暴，不是屠杀。甚至同样是特别行政区的澳门，终审法庭都可以完成接受中共的定性，说这场运动是反革命暴乱，说数以千计的平民学生被屠杀是有悖事实的政治宣传，这样的黑白颠倒没有发生在香港，很大程度是因为有维园的烛光。

这样的黑白颠倒没有发生在香港，很大程度是因为有维园的烛光。

但其实，政权不是不想消灭在香港的六四记忆，不是不想消灭维园烛光和支联会。只是在今年之前，它都未能得逞罢了。支联会在创立之初，已经被中共定性为一个颠覆的组织，当年中英双方的人马，许家屯、李鹏飞等等，都去劝我们的创会主席司徒华先生解散支联会，未能得逞。到回归了，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还是继续劝华叔，不要搞六四悼念了，同样未能成功。

软的不行，就开始来硬的。2010年，支联会在时代广场展示民主女神像，被没收，多人被拘捕。2014年，我们在尖沙咀置办第一所永久六四纪念馆，被亲中法团滋扰、逼迁。2019年，我们再次置办第二座永久六四纪念馆，装修期间已经被人上门搞破坏、淋电掣。到了去年，疫情给了当局最好的借口去禁止所有的公共表达，六四的游行、集会，第一次被禁止。但不少市民都仍然到维园，到全香港各地，点起烛光，见禁令无效，当局高调检控大批在维园的市民和支联会常委。

到国安法通过之后，建制中人不停放风，说支联会纲领违反国安法，说北京要取缔支联会，恐吓市民不要再参与支联会的活动。我们搞了31年的维园年宵摊档，今年第一次被食环署无理单方面终止合约，我们的六四纪念馆也被食环上门关闭。同一时间，港台的六四节目被抽起，甚至只是在节目最后播一段六四长跑片段都要被严厉谴责。以六四为主题的街站、电影放映会被滋扰、被中断。而学校更加是重灾区，教科书上面，历史书，关于六四的内容被删走，被淡化，不会再提军队屠杀平民，学校老师越来越不敢请支联会去跟同学讲六四发生什么事，也无法再带学生来六四纪念馆了解历史。

其实六四这个记忆，这样打压下去，就快要断了。不出所有人意料，今年的六四游行和烛光集会，再一次被警方禁止。之后的发展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六四当日，数千警力，围封维园，终于成功让六四的烛光，在今年断绝，在维园不再燃起。但这样它都不够，不到3个月，在8月底，当局动用国安法43条下面的权力，以老屈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的手段，索取大量资料，迫使我们关闭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让大量的六四的史料瞬间消失。当我们的常委，据理力争，我们就全部被检控、还押，甚至支联会本身这间公司都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所有常委在囚、公司运作陷入停滞，当局继续穷追猛打，要剔除公司注册，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之下，我们的成员在9月25日议决解散支联会，让这个32年的组织画上句号。但解散都未完，一解散完，就说要查封我们的财产，所以我们现在连律师费都给不起。而在这些

事情发生的同时，是针对整个反对派、整个公民社会的扫荡，大批民主派领袖，被捕入狱，连参与选举都成为罪名，大量民选议员被迫辞职、被 DQ，无数民间组织、工会甚至学生组织都被迫解散，新闻媒体被关停，苹果日报执笠，言论创作自由受到毁灭性打击，现在连跑个长跑都不可以说“香港加油”的 T 恤。

禁止六四集会不是一个单独的事情，整个脉络，所有事情，都在显示政府其实在做什么。结论写在墙上，政权就是要消灭所有反对的声音，而六四的烛光集会它是达到这个目的上，必须要盖熄的其中一个行动，疫情也好、公安条例也好，只不过是方便的借口。而其后发生的事情，不到 3 个月就对支联会拉人封艇，正正是证实了我当时的这个判断。

禁止六四集会不是一个单独的事情，整个脉络，所有事情，都在显示政府其实在做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支联会一方，早早入纸通知，我们要搞游行集会，我们表示我们会遵从所有社交距离、防疫措施，持开放态度，愿意和当局任何部门商讨如何可以兼顾防疫，让六四悼念可以进行。但警方的反映，整个月不理你，随便跟你开个会走过场，不给任何方案给你继续进行集会、进行悼念，快快反对就完事。明明我们看到的是，同一段时间，林郑刚刚宣布，第四波疫情完结了，香港人是工照返、戏照睇、地铁照逼、演唱会照开、商场照行，所有这些活动，人的拥挤程度，都会比六四集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自己每日上班逼地铁都知道。明明我们见到，世界各地，都有可以兼顾防疫和示威集会权的方法，唯独香港永远一刀切，所有反对派的集会游行都不给进行，明明我们知道，法律上，政府有积极责任促使集会顺利进行，但警方永远把球推给民间团体，只会强调集会自由不是绝对，完。明明我们看到公安条例没有赋权警务处长用公共卫生理由禁止集会，但疫情一到，警务处长就可以自我扩权，而没有人可以出来制衡他。明明就算禁止支联会通知的集会，是禁止一个集会，但政府可以讲到，所有六四悼念都会犯法，穿黑衣是会被捕，可以把禁止无限扩大。

面对著警方这样的滥权，面对政府步步进逼去消灭六四记忆，我们如果不作出任何反抗，就是默许真相被掩埋、死难者沉冤莫白，而我自己，作为支联会的副主席，当我们主席李卓人、另一位副主席何俊仁都是在囚的时候，是更有责任，在今年，去延续、推动六四的悼念活动。即使我们认为警方的禁止是违宪，支联会作为一个有众多成员和包袱的组织，是不能冒著被检控的风险去彰显我们的权利，所以我们也公开宣布了支联会不会在今年举办维园烛光集会。而这个也是第一篇 facebook 文章为何出现，我也表示非常遗憾，非常对不起香港人，做不到这件事。

唯一方法就是用个人行动去延续、甚至扩散，本来在维园的烛光。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是不断写文章，做访问，摆街站，去叫大家记住，呼吁大家继续用行动悼念六四，呼吁大家克服恐惧，不要因为权力无理的恐吓就连我们基本的表达自由、行动自由都不再去做，不要被所有白色恐惧瘫痪我们的行动能力。

我这里有一些街站、访问的记录，想给法庭看看，我当时对公众的呼吁是什么内容。街站内容我找不到片段，感谢国安处帮我记录了我讲了什么，里面 D4是我，这里是一些新闻报导，是我接受采访的时候讲的话。

其实我在这段时间，对公众做的呼吁，行动的呼吁，只是叫大家 6 月 4 日八点，点起烛光，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可以到哪里，遍地开花。而这个模式，其实自上年六四维园烛光集会第一次被禁之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不用集会形式，都还可以表达集体力量的方式。作为一场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给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参与的方式给大家，才有可能动员最多的人参与其中，而遍地开花，正正是这样一个平衡之下的方法，给到每个人因应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因应自己可以去的地方，自己选择一个地点，做一个行动。

但作为一个共同的行动，一个政治的表达，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这件事是要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去做，而不是自己躲起来，做给自己看。如果法庭要说，这样一个没有指定地点的行动呼吁，都是在煽惑一个未经批准集结，那我也很疑惑，这个集结是在指哪个集结、在哪里的集结，是否地点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个时间点点起烛光，就是在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如果这样说，不如直接承认，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个人，点著烛光，走入维园，可以犯什么法。

虽然六四点烛光的行动，没有一个指定地点，但最有象征意义的，也最大风险的地方，一定是维园。但因应政府摆出来的态度，警方摆出来的各种放风、威胁，维园确实不会是很多人愿意或有能力在今年再去做这件事的地方，但无疑，是最多人还想见到有烛光亮起的地方。因为维园的烛光，象征著一种承诺，一种坚持，一种坚守良知的勇气，而最责无旁贷应该去维园做这件事的，无疑是在维园举办了 30 年烛光晚会的我们。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个人，点著烛光，走入维园，可以犯什么法。即使我公开说，我会做这件事，那是否说现在法律不允许我公开说我会做一件合法的事呢？是否说只要有人通知了集会而警方禁止，警方就有权将一个完全公开的地方，画成禁区？就有权禁止所有人就相关议题作表达呢？将维园守到铜墙铁壁那样，真的跟防疫有关系？

但刚刚其实都讲到，法律的分析是一回事，实际的风险是另一回事，这个确实是现在香港的现实，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我自己愿意，也觉得有责任，去承担这个风险，但我不可能预期，有很多的人，和我一齐去做这件事。无论是事前和友好团体的沟通、在街站和市民的聊天、网上的讨论、社会的气氛，其实都说得很清楚给我知道，像往年那种大规模集会，其实今年，不可能出现。

到了六四那天，如果有十几二十个人，和我一齐，尝试进入维园，已经是很好的结果，更大可能是小猫三四只，甚至只有我一个。但是，即使只有我一个，我都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维园的烛光，经过 32 年的沉淀，已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反对专政的象征，我们可以守住它多一年，香港的自由，六四的真相，就多一分保障，即使是能去维园的人不多，只要有，我们都还可以说，维园的烛光未死。当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的时候，最起码，我们都还可以用个人的力量，做最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将每个行动的政治力量放到最大。正如当年的“坦克人”，他不是因为见到后面有千百万人跟著他上去，他才去挡住那列坦克，而是即使他孤身一人，他都必须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件是正确的事。

而如果我们自问是在传承八九的精神和坚持，我们就要有这种，不论人多人少，不论高潮低潮，都坚持下去的决心。我当然不会否定，我很想很想见到维园依然烛光如海的画面，但同时我对时势都有很清醒的判断，若然到了当日，维园真的只剩下几点烛光，甚至是被当局成功，完全没有烛光亮起，那我更要向公众解释，那几点烛光的意义，32 年来维园烛光的意义，和当局为什么这样大决心要禁绝维园的烛光。这些话，今年不讲，很可能以后都不会有机会再写，气候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会有明报的那篇文章，匆匆忙忙一晚写成，不是很成熟的文字，但当局如获至宝，觉得可以用来搞文字狱了。它甚至抄足国内打压六四的手段，作预防性拘捕，6 月 4 日一早就把我抓了，关足 30 多个小时，让我完全无法在六四当日作任何悼念行动，而之后我也因为同一单案而还押超过一个月。再之后对支联会的行动更是上纲上线，说我们 32 年的悼念活动是颠覆国家，是受外国势力的煽惑，但我想讲，驱使香港人 32 年坚持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个人的良知。

驱使香港人 32 年坚持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个人的良知。

说我那两篇文章煽惑了大家，是抬举了我，也是看低了香港人。我们看到即使维园被封禁，去到西贡、去到屯门，铜锣湾到旺角，都还是有人亮起烛光、点起灯光，不需要谁去召集他们去什么地方集会了。这个就是香港人的“如水”，香港人的坚持。

其实，八九年的时候，我只有四岁，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我要这么执著这件事，是香港人，是 30 多年每一个在维园点起烛光，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教会我，什么叫择善固执，而我所做的，只是传承、发出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去做一个普通香港人在这个时间想做的所有事，去不给当权者垄断所有真相和意见。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这些字眼，不如说，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如果要因此受刑的话，我亦无怨无悔。以上是我的口供。

